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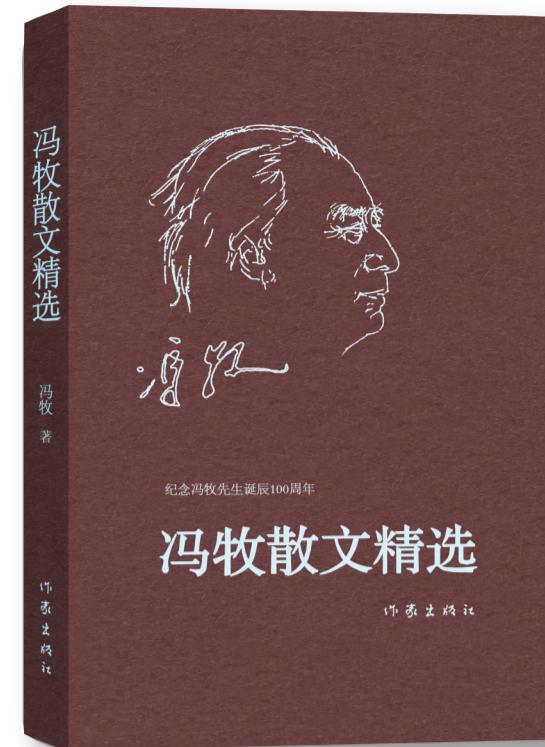
在中国的谚语中,有“久病成医”之说,却从未见有人提出过“久病延年”这样的接近于“二义悖反”的说法。

应当说,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或是“创造”。

大约在“文革”后期,我刚从被流放的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四壁萧然而又百无聊赖;大约是和林彪的“折戟沉沙”有关,我曾有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相对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时我既无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无执笔写作的心境,于是我除了读书,享受那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之外,还曾经用篆刻来排遣那漫长的时日。我从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谱中发现了一幅铭刻在秦汉瓦当上的铭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笔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闲章,是仿汉印小篆体的四个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种自勉,又是一种和老朋友之间的共勉。印章中的这个“病”字,其实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当时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风暴,给我们这些从青年时代起便决心献身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既表现在心灵上也表现在肉体上)。我和我的许多老朋友当时都怀有这样的心情:无论我们所受的压力有多么沉重,无论我们仍将面临着多么严重的生死考验,我们都要坚定地斗争下去和顽强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国命运推向深渊的邪恶势力垮台为止。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期望值并不高。记得在当时我和几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会中,我曾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朱丹说过这样的话:“只要让我亲眼看到江青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倒台,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一个星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话,我后来也对郭小川讲过。他同意我的话,却又批评我太悲观了,尽管他后来悲惨的经历,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要比我悲观得多。

但无论如何,在那与其说是忍辱负重毋宁说是忍辱偷生的岁月里,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信纸的一角钤上这方题为“久病延年”的闲章,作为期望,作为激励,也作为一种袒露心灵的表示。后来,我又刻了好几方同样的图章,分赠给几位能够懂得它的含义的朋友,而且还获得了些朋友的会心的赞可;我相信,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患难的朋友手中。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件事情大约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谈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这方图章所包含的一层意思。“久病延年”中的这个“病”字,还包含有另外一层意思,一层实实在在的意思。这指的是,对于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这样的当时身体很不健康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有一种建立在坚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状态,一种



旷达而开阔的胸怀和心情,一种时刻都能自觉地发挥精神上的主观能动性的意志,一种正常的,既是随心所欲又是有所节制的生活方式,同样地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艰难的条件下,平安地顽强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可以为我的这个主观论断作出相当充分的印证,我始终认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我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早已年逾古稀。但我从十七岁便患上了相当严重的肺结核和肋膜炎(后来又发展为慢性胸膜炎)。再加上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严重哮喘病,因此,可以说,将近六十年来,我从来都是与疾病为伴,几乎没有过一天可以称为“健康人”的日子。记得1938年初,我带病逃离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艰苦跋涉,才来到延安,其间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人所难以想象的。我父亲(一位正直的知名学者)曾经以焦虑的心情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

文 摘

久病延年

□冯 牧

说,他绝不反对我参加革命,但以我的身体状况,他担心我活不到三十岁……但是,后来我不但愉快地(也是艰难地)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正准备和野战部队渡过长江,住在一个担任突击部队的团指挥所里,当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一天我正在进入“而立之年”),而且随后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与了解放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大部分战役,最后,经过了几乎基本上是靠步行的长途行军,来到了云南边疆。

我的生命在云南得到了一次挽救。那里的医院以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治好了我的结核病和大体上控制了我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但是,对于我的脓胸病,医生们却表示了一种束手无策的忧虑。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认,我能够顺利地活过了三十岁,是由于一种幸运的机遇,是由于一种带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命运对我的宽容与厚爱。

我的脆弱而顽强的生命,在1956年得到了第二次挽救。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被送到北京来做大手术:云南的医院怀疑我得的是肺癌,而且把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过早地透露给我了,我想我今天可以欣慰地说,我当时不但没有被这个可以摧毁人的意志的消息所压倒,而且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豁达而平静的心境。我想,这种心境,是使我后来得以顺利地战胜无数次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难,而能够继续顽强地活了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的,是两位杰出的医生——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和黄国俊教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条件下,他们为我做了一个长达十个小时的开胸手术,基本上解决了使我多年深受折磨的脓胸症——而且是一种罕见的“包裹性脓胸”。用黄国俊的话来说是:“我们从你左胸里给你摘除了一个中号暖水袋!”而且多半是出于对我表示安慰的好心,他当时还对我说:“你不要悲观,像你得的这种病,在我们的病例记载当中,存活率很高,有长达十一年后现在仍然健在的!”

听了这些话,我当时不但不悲观,而且还为此激动不已。

我想,我的日子还长着呢,即使我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也一定要努力给他们创造一个新纪录——再存活十二年,到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呢!

而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已经“存活”了三十八年。而这三十八年,我所跨越、所经历的,又绝非是一条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生活道路。但是,尽管在这漫长岁月中,我又经受了那么多的意想不到的疾风骤雨的冲击,使我常常感到,我所走过的每一段生活历程,都好像是在湍流急浪中搏击前进的。不论是幸,还是不幸,反正至今虽然我所拥有的依然是一副时时为病痛所苦的孱弱之躯,我却仍然能够生活得平静而自如,仍然能够为我所献身的事业做出点点滴滴的微小却是无愧于心的奉献。而且在不久之前,刚刚愉快地度过了我的七十五岁生日。

有不少人曾经向我问起过我的“养生之道”,怎样才能做到“久病”而又“延年”,我却往往难以作答。我平生与烟酒无缘,从来不吃补品,也不练“气功”,除了热衷于长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进行持之以恒的体力锻炼,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保护身体而必须屈从于种种纯属臆想的违反自然的“清规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对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认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绝不动摇。对于种种邪恶现象,我也绝不缺少那种嫉恶如仇的义愤。但我也始终认为,人应当具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我承认,我的性格也许过分温和和过分宽容,以至于从延安时期直到现在,我头上长期被扣上的“温情主义”和“缺乏斗争性”这两顶帽子,从来没有被摘掉过,有人甚至因此以“东郭先生”相讥,我对此也并不介意。我的一条自然形成的生活准则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原则问题,我绝不含糊,而对于那种纷至沓来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谈,我采取的是既不斤斤计较,也绝不跟自己过不去的态度。只要是于人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

就是这样,我走过了自己艰难而又无愧无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已经大大地,超额百分之三百地完成了我父亲当年所期望于我的“生命计划”。对此,许多人为我庆幸,有人则不那么高兴,但对我来说,至少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久病”能够“延年”的绝非虚构的范例。

因此,不管怎样,“久病延年”这四个字一直被我视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别人也能由此得到一点启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

(摘自《冯牧散文精选》,冯牧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春 运

火车站内,弥漫着呕吐过后的疲倦、场情失意的困顿、商业信息泛滥无着的术语、金融秩序的紊乱言辞、流浪者一再转徙之借力点,总之这里仍然是生活的现场。

城 市

城市是福楼拜的庸见与橱窗式孤独的一次象征性联合,总是让人想起维柯定义的城市概念,城市起源于收容所(避难之地)。这个收容所暂且不要把它理解成无家可归之人的集会,先不要这样说,因为他们都不想回家。通常意义上家的概念被城市刷新了,城市是家的意淫与梦魇。人企图在城市当中一次性完成对家的叙述、还原与整合,但目的并非回家。

所谓对家乡的眺望是可疑的,这个动作在古典时代是诗性的回首:苏轼之于四川、庾信之于江南、孔子之于鲁、周公之于幽。《桃花源记》是对政治的反抗,未必也反抗城市。陶渊明所要求的隐居生活亦并非针对城市而言,仍然与政治有关。所谓结庐在人境,他心中并无城市概念。城市的兴起与陌生人有关,大量的陌生人作为客人来到城市。一段时间以后,城市不再是不幸者的最终归宿,谁又能说他们都是失去幸福的人呢?喜欢城市的人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城市见证了别人的苦难生活,收容所的意义已经完全被所谓的繁华掩盖。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已经兴起,繁华令人恐惧。古代日中为市,然后各自回家。现在,不需要回家了,城市就是家。

然而,厌倦总是在满足之后。就算你不厌倦,那说明你是孤立的一代人。但是,代谢之际就产生了厌倦。人,太容易被满足。马尔库塞描述了这种“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发明了所谓的“公共空间”,文明深入了,现代性的城市开始崛起,然而弗洛伊德说,是文明(城市之魂)导致了不满。当我们失去了最后的回归之地,故乡也无法再一次被描述。于是诗人阎安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是梦的孩子,我是世界的孩子,我居住在我的玩具城里。”我们看到,一个以世界为舞台的孩子却只能住在玩具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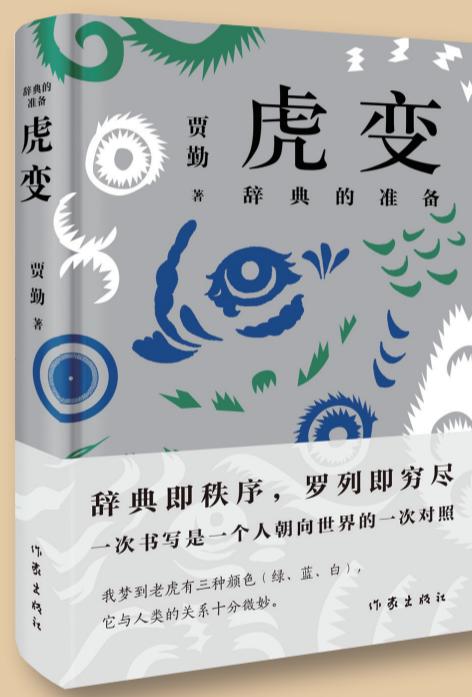
玩具城暂时超越了现实之城,仿佛一次由于疏忽而导致的机会,少数人在其中得到了补偿与解脱。然而王者,正是那个孩子,可能再一次归来。

家

习惯所有的家。世界,支持每一种链接的端口,接受每一种系统的默认,我却保持着完全不同的习惯。宅兹中国,宅是一个平均概念?家不是一个平均概念,家一边倒,家是焦点。如何布置不同的东西,因地制宜。在家细节如一副扑克,要设法打成一局牌。

我们与家这个概念对抗和解,我们自定义、自迁徙,退避三舍,离间家的本质。如是变焦,以旅为归,家何在?——献给曾经租住过的全国各地的

《虎变:辞典的准备》(节选)



“大人虎变,君子豹变”,贾勤凭一己写作,怀想“大人”境地。本书以辞典的形式构成,从A到Z,罗列万千,每一个词条的解释却又内含作家的选择、判断,是一种贯通经史子集的实践,亦是一种现代派写作行为,其扩展的,是“长篇小说”乃至“小说”的疆域与抵达能力。

数十处小区之“家”。我说过,故乡并无地理学上的意义,家也是。

命 运

个人开始觉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命运之时,想象中的命运之神就诞生了。一开始,仿佛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之神,随后人们发现了规律,就比如每个人都有属相或星座,但很快人们发现星座与属相的数量是有限的。人们发现命运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尽管人们仍然在乎命运的差异,但已经无力主动地选择了它。

多年以后,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女儿,总会有向世界吐露真相的时机。然而作为答案,本不必说出,我一向是知道的。频繁的交往过后,她或他隐隐约约,仿佛要解释什么。这种解释的冲动伴随着某一次深夜里的谈话愈发强劲,箭已上弦,我分明地感到很压抑,已猜到七八分,但我仍然觉得可以说。原因通常是因为你正在显露,但却是通过母亲遥远的呼唤来成就的,尽管你常常靠边站,想要安静下来,但社会的边上并非人生的边上,不能混为一谈,你的边缘在黑夜里隐藏。深入夜的那些人只能是少数人,其中包括母亲。母亲为你出生于而死于。

根据我们东汉的《白虎通义》,命运也被分为三种:寿命、遭命、随命(《春秋繁露》谓之大命、随命、遭命,详参《论衡·命义篇》)。寿命是正命,善始善终,是一个人所得于天的全部(不论长短)。行善得恶,祈福不应,于是,在正义的立场中我们无法解释君子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随命是应命,因人之不同作为而赋予人相应之命,善恶随报。总之,天赋肉身正是接种命运,进而展开其图式的基础,因基构础,经其戮力实践而得到的东西早就内蕴秘涵于命运。而主客交撰,彼此取长,都将接受命运的考验,人必经此历炼或者才能明确他的任务。

母亲也有迷惑的时候,作为创造原因的人,她对待这种迷惑的态度决定她最后对于世间的期望与挽留。歌德写道:“我吃力地撕开了一个最高的神秘。女神们在孤独中登峰造极,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时间尚未存在,人类在困厄时才谈起她们,她们就是母亲。母亲,你害怕了吗?母亲,母亲。这是一个多么奇异

言,人类仿佛正是命运先遣的使者(然路径积分终不敌混沌分形也)。

母 亲

母亲是有期待的,然而来不及看到一切发生,几乎从来都是这样。没有谁曾经见过,人在世上欢欢喜喜。母亲,由于她的创造者的身份,所以更加沉痛,当初的创造固然伟大,日后的重托尤其难负。我想得到她们的心愿。

多年以后,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女儿,总会有向世界吐露真相的时机。然而作为答案,本不必说出,我一向是知道的。频繁的交往过后,她或他隐隐约约,仿佛要解释什么。这种解释的冲动伴随着某一次深夜里的谈话愈发强劲,箭已上弦,我分明地感到很压抑,已猜到七八分,但我仍然觉得可以说。原因通常是因为你正在显露,但却是通过母亲遥远的呼唤来成就的,尽管你常常靠边站,想要安静下来,但社会的边上并非人生的边上,不能混为一谈,你的边缘在黑夜里隐藏。深入夜的那些人只能是少数人,其中包括母亲。母亲为你出生于而死于。

无穷的袒护与包庇,无限慈悲的爱。母亲看到一切,有了深深的嘱托。当这种殷切的嘱托被你察觉时,你才有了上面说的“陌生感”,如此陌生,可见你被遮蔽的程度,你长久地消失在更多的人中,让我在人群中无数次与你相逢,我有能力把你找出来,因为我只需要叫住任何一个人,他就是你。而母亲,不像我这样的逞能,她只是在最终时刻,唤醒了当初孩子的乳名,那正是你。

个体从集体中被确认,被还原为每一个独立个体,这种浩大的工程被我称之为“人类工程”。把你濒临泯灭的心性从群众之中缀连缝补,你是惊异的,你不知道你正在显露,但却是通过母亲遥远的呼唤来成就的,尽管你常常靠边站,想要安静下来,但社会的边上并非人生的边上,不能混为一谈,你的边缘在黑夜里隐藏。深入夜的那些人只能是少数人,其中包括母亲。母亲为你出生于而死于。

意,不同于天地的无情辩证,不同于绝对的抽象逻辑,只是母亲一人的秘密与向度,你却称之为“陌生”。

时 代

时代这个词多么可疑。它是时间与人正面冲突之后留下的疤痕。我看到吾人面对时间之束手无策。这一切到底是正在演练呢?还是在重复?还是真的永不复返,虽是彩排,却也只是一遍。滑稽与庄严尽于此矣。夕阳云海之中,矗立着一个医院的红十字。

黄昏的光又收了一分,有微风送上,巷内归人大都骑着电瓶车。突然,楼下的女人换了一套艳丽的衣服跑出了巷口。月亮又明了几分。

时 间

时间,作为一种我们暂且还可以容忍的观念出现时,我们才真正把它给忽略掉。被我们重新找到的原因,才真正构成了所有的原因。诸多逼迫,无一例外。时间的虚妄显示出历史的光彩来,比较而言,历史是真实的,我们有可能理解它。比如说,永远的现在,就是对它的一次赞美(爱因斯坦所谓在局限中赞美,易经谓之幽赞)。而空间是时间的一个反概念。扬雄说:“阖天谓之宇,辟宇谓之宙。”宇宙流畅无内,宇宙虚度宇宙。时间一词本身具有创造性、音乐性,它是一个流动的长度,而不能被划分,非线性之几何形式也,亦非概念性所指(空间是一个概念),时间惟表现于艺术作品中。时间是理想化的产物,所以时间本身无从谈起。男人在时间中觉醒,而女人本身就是时间、就是未来与死亡。时间的循环不是时间的特性,而是人的感觉,其实它是不可逆的,也不循环。人的传承好像一种循环,传统好像一个圆。

我 爱 你

年轻人只会说这三个字。中年人则利用夫妻纠纷的矛盾批判这三个字。老年人善变,能够随意组织类似的话,表

达相同的东西。总之,这三个字仍然是清晰的,它一直回荡在我们的人生中。或者隐藏或者暴露,它曾经是被遗忘的要求,也是惟一明确的目标。

你我之间已被“爱”字隔开。我对这种迎面而来的悲伤并不感到陌生,我终于失去了它了。这种悲伤仅仅只是一种结束的象征,一次提醒。而生命的洪流仍将灌注,仍将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那里正酝酿着为新的悲伤而设的一切快乐。

直 播

现场直播体现了时间的幻觉,它让仿佛是属于个人的时间都有了意义,参与即幻觉。芬雷论述过一种“倒计时的幻觉”。而转播,亦能使个体愤怒麻木,永远感到无聊,仿佛属于他们的时间已经被剥夺,某种错过之后的子宫底里的不甘后人的自尊与傲慢。“我不看转播”,比赛的结果和我无关。我们对时间的监督与控制被打断了,转播意味着永远的滞后,它还进一步影响着此时的直播,使人心烦意乱,一种挥之不去的厌倦袭来,再也不会有令人激动的陌生的像是打开礼物自我催眠的直播了,永远失去同步的可能,永远的道听途说。

咒 鸣

某人若用方言开口骂人,你才能确定其是地地道道的生长于九州大地之人。骂声嗓音在庸常劳作中脱颖而出,焕发着活力,迎难而上,与暴力实现着一次小小的联合。一旦骂过之后,便又是平凡;平凡而无趣,我们领会的太多。开口变成了武器,没有更好的交流。“朋友好交口难开”,骂人更难。咒骂者撩乱撕扯广大范围内弥漫的文明虚幕,桑槐并毁,痛快淋漓;开口才有真相,骂人才是真理。意外滞留于庞杂方言的国骂系统,我惧怕换汤不换药(普通话是药,方言是汤),文明总归是一场大病。

(摘自《虎变:辞典的准备》,贾勤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虎变:辞典的准备》后记

这些辞条的选择性罗列,并没有策略上的考虑,它使我们看到了词语交互发明的真相。直接从词语本身开始,仿佛单打独斗,彼此加深了解才可能真正尊重对方。握笔之际与敲击键盘之时,灵感都会降临。辞典写作并非一个新概念,《周易》与《说文》是我心中两部完美的辞典。

辞典写作是一种慢写作。它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概括,也是对写作本身的概括。它并不直接从生活中得到援助。它企图完全避开生活内容,让生活归于一场梦。这种慢并非刻意的选择,慢仍然使写作本身变得突然,生活并没有与任何人擦肩而过。一部辞典,就像封闭而精密的钢卷尺,它可以测定我们的生活,甚至保证某种与之同步的精确,但是不要打开它,不要单独看待那些辞条,意外崩放的钢尺,一旦脱离寄身之所,再也不能收放自如、完美地表达自己了。

作家心中都有一部辞典,不同的词语构筑不同的人生。从A到Z,类似于从乾到未济,一切并未结束,它才刚

刚开始,循环之后,空空如也。绕梁三日不是音乐的全部,一部辞典并非无限,辞典写作的意义涉及如何评价意义本身。词语,从发声到扩散,牵扯进来很多东西很多人。词语,冲出黑暗的躯体,在光明的空气中扩散。词语,给出存在核心的证据,它必将使一个世界变得多端有序。当然,我无法清晰地指明影响我写作的人或作品。写作,必然是传统所谓“集解”或“疏不破注”,此注即人本身、物本身。此疏遂获得暂时之栖居,与语言共振。鱼龙寂寞,或疑海大,总之,个人写作的界限我已探到,我不会成为作家。这是否让人喜悦?

不用成为作家,成为身份之驱动者,可以无憾。